

## 市场经济的两条道路：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赖慧婷 鲁春义

**内容提要** 所谓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在东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新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再发现或再阐释而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的阐释。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即自然道路和非自然道路,前者建立在国内贸易的基础上,其发展遵循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对外贸易的自然顺序,其典型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通过动员人力资源以改善经济状况的“勤劳革命”,其所形成的是一种以劳动密集、能源节约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后者建立在对外贸易的基础上,其发展遵循从对外贸易到制造业再到农业的非自然顺序,其典型是以荷兰、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地区,通过资本在无休止积累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其所形成的是一种以资本密集、能源消耗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讲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 市场经济 自然道路 非自然道路

**中图分类号** F014.3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从确立到日臻完善的历史进程。从最初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疑虑,到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的升华,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进程中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不惑”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确保其行稳致远,需要我们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因此,参考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仍然十分必要。在此过程中,新斯密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两条道路的阐释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 2019-04-30

**作者简介:** 赖慧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鲁春义,通讯作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7CKS005)的研究成果。

## 一、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再发现+马克思主义

所谓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在东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新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再发现或再阐释而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新理解和新认识。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首先在文章《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评论》(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中提出了一个所谓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范本”。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乔万尼·阿里吉,2009:8)。根据阿里吉的提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人们对东亚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发展的关注,而围绕马克思关于世界将趋同于资本主义的预测的讨论和反思,则是这一理论产生的直接契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推动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他们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迫使一切民族和一切地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最终按照它“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2009:35—36)。虽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预见被实践所深刻地证实。然而,世界却并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趋同化,而是首先出现了一个像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路高歌猛进,大刀阔斧地在全球建立殖民和信贷体系,接连成为世界霸主;与之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却急剧衰落。此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也融入了世界市场之中,但其所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新斯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所建构出的一种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它首先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进行了区分,明确指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对前者的理解需要回到斯密,后者则需要回到马克思。由此,新斯密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再发现和再阐释;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

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斯密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在既定社会框架内出现的,它利用那个框架隐蔽的潜力推动经济增长,但它并不从根本上改变框架本身”;“第二种类型倾向于破坏它在其中产生的社会框架,并为拥有不同增长潜力的新社会框架的出现创造条件”(乔万

尼·阿里吉,2009:33)。前者被称为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自然道路”;后者被称为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非自然道路”。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一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也即市场经济的“自然道路”,是由斯密本人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第二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也即市场经济的“非自然道路”,则是在马克思那里得到详细阐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非自然的’道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乔万尼·阿里吉,2009:68)。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是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二。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两大原则:一是资本的无休止积累;二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创造性破坏。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1)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理论建立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前提下,在这个世界上,劳动力完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都在大致等同于其成本的价格上自由交换。(2)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参与市场交换并不是为了把商品转化为具有更大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为了获得更多数量的货币,这一过程反映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 $M-C-M'$ ”中。(3)马克思认为,技术和组织变化不仅来自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出现了新的贸易和生产专业化部门,而且也来自资本和劳动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持续不断的冲突。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分工的提高是资本所有者在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中获得权力和致富的基本条件,其最终结果是劳动日益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的工具。(4)资本的“无休止”积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1995:297),这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动力与资本主义发展容易出现的危机的倾向密不可分,如利润率的全面下降和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积累的原有社会框架遭到破坏和新的社会框架的建立。(5)资本的自我扩张不断颠覆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不同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2009:412),这种经常遭到破坏的平衡就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它主要有三种形式:①“扩大资本规模和重组经营企业”;②“形成剩余人口和新的国际分工”;③“生产更大的资本积累中心”(乔万尼·阿里吉,2009:75)。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在无休止地积累过程中不断进行“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 二、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通过重回斯密和马克思,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其中最核心的、也是最有创见的部分是其关于市场经济的两条道路的阐释,它构成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的两条道路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而是被斯密加以理论化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斯密加以理论化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沿着一条道路而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出现的,即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和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道路”(乔万尼·阿里吉,2009:61)。前者可简称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后者可简称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

### (一)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

借助于重新“发现”的斯密,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为范本,它的发展遵循如下顺序:一国的大部分资本,首先应该被用于农业,因为农业是一国发展的基础。其次是制造业或工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在此过程中,农业的改良和延伸为制造业或工业投资创造了需求,制造业或工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和制造业的相互支持中,国内贸易得到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当由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扩大所产生的剩余产品在海外销售比国内市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时,对外贸易自然产生,“由于对外贸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规模,产生新的生产专业化部门的新机会就出现了,资本积累的新机会也出现了,这种资本首先能够有利可图地用于‘供给该国的消费,并维持其生产性劳动’。出现这种情况时,‘(资本的)剩余部分自然把自己抽调出来投入运送贸易,并用于完成对其他国家的职责’”(乔万尼·阿里吉,2009:52)。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的过程,其内在的动力是建立在分工扩大和深化基础上的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改善提高了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了市场的广度,从而为新一轮的分工和经济改善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良性的循环会遭遇该过程的地域规模和体制环境对市场广度的限制,出现劳动力的剩余和资本的短缺。它符合斯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描述,即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分工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所谓的“斯密动力”),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陷入的困局被称为“高水平均衡陷阱”,即所谓的“斯密陷阱”。

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如何走出上述困局?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

过程中,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将目光转向由速水融(Hayami Akira)、杉原薰(Sugihara Kaoru)等日本学者所提出并加以阐释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上(Sugihara Kaoru, 2003: 78—123)。所谓“勤劳革命”,指的是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要依赖于人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而言,1800年前的东亚核心地区和西欧核心地区在人口和土地比例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东亚地区人口众多而土地等自然资源有限,为了适应自然资源的限制,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劳动密集技术发展基础上的劳动力吸纳体制,在此模式下,人口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恶化,经济过程得到了逐步改善——虽然劳动者不得不进行更辛苦和更长时间的劳作,但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劳动者在此过程中学会了珍惜工作并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工作道德”。勤劳革命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铺设了一条独特的技术和制度道路,在迎接和追赶西方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通过动员人力资源以寻求改善经济的做法,即使在把西方先进技术吸收到它自身经济发展中去的过程中,仍然表现为该地区发展道路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在于:它是一条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此外,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勤劳革命还创造出了一个东亚模式的“分配奇迹”(如果说西方工业革命创造出的是一个“生产奇迹”的话),它通过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总之,通过勤劳革命,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被认为是一条可行之路,这条道路不仅使“大分流”之后的东亚地区能够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它还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

## (二)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

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为典型,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它们(即‘欧洲各国’,笔者注)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迫成的。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习惯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亚当·斯密,1972:350)。换言之,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所遵循的发展顺序是“对外贸易—制造业—农业”(沈斐,2016)。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即由马克思所深刻阐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首先,它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直接的生产者丧失了对劳动资料的控制,那些组织生产的人丧失了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外原有的阶级地位;市场竞争迫使生产的组织者削减成本,通过生产的专业化和创新使利润最大化;而直接的生产者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生产的组织者,并让自己服从于后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其次,资本的无休止积累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最后,资本的过度积累使社会生产陷入危机,表现为有效需求同社会供给失衡、生产相对过剩、利润率全面和持续地下降,等等。

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于上述危机,斯密和马克思有不同程度的预见。但马克思并不像斯密一样,认为这种危机是资本进一步扩张不可逾越的障碍。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sup>①</sup>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或延缓了上述危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扩大资本规模和重组经营企业”。资本规模的扩大有两种途径,即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当竞争加剧和利润率下降时,一部分小资本就会消失,另一部分则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马克思、恩格斯,2009:279)。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体系在扩大资本规模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它逐步成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资本的集中扩大和加速了技术与组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积累的继续进行创造出了新的条件。二是“形成剩余人口和新的国际分工”。资本的集中和企业的重组同劳动后备军的形成和国际分工的重组相伴而生。技术和组织变化的扩大和加速强化了资本密集和劳动节约的资本主义发展偏向,产生了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从而为资本主义新兴的生产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通过内部制造出的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资本主义大工业仿佛获得了一种弹力、一种“跳跃式”的发展的能力,这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在机器大生产过程中很快被克服,“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2009:519),它迫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变成其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在此过程中,一种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以服务于从事工业生产的另一部分地区。三是创造出更大的、新的资本积累中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国债和信用体系的讨论更多的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框架下进行的,但是马克思承认“国债作为把剩余资本从衰落的资本主义积累中心转到上升的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手段具有持续性重要意义”(亚当·斯密,1972:78)。在资本积累遇到障碍时,它可以借助国债和国际信用体系转移到一个更大的、新的平台上来逃脱积累的停滞,例如从威尼斯转移到荷兰,从荷兰转移到英国,再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等等,然后在新的平台即产生的资本积累的新的中心重新开始更大规模的积累。

### (三)市场经济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

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和非自然道路不仅在发展顺序上不同,其发展动力、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方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两条道路孰优孰劣?

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相较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市场经

<sup>①</sup> 借助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关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概念。

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主要有如下优越性:第一,斯密为政治经济学确立的目标是强国富民。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更加符合这一目标。例如,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主要建立在国外贸易的基础上,而自然道路首先将资本投入本国农业和国内贸易,它不仅能够带来较大的收益,而且能够为本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投入对外贸易的资本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不如国内贸易那样直接和确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能保证它最终能够在国内经济中产生同样的收益和就业,这也是斯密建议立法者推动非自然道路自动地与自然道路趋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形成的是一种以“劳动密集、能源节约”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形成的是一种以“资本密集、能源消耗”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不仅大量的劳动力被生产过程所吸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也明显高于后者——因为在后者也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必须绝对服从于资本,并且由分工所带来的人的片面化发展更加严重。此外,考虑到与工业化扩展联系在一起的环境破坏,前一种模式更加具有发展的持续性。第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在实质上是一种以生产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稳步改善的过程。而以资本的无休止积累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建立在资本无限扩张的基础之上:在国内,资本利益凌驾于整个国民利益之上;在国际上,资本的无休止积累带来了全球动荡。

### 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讲述的中国故事

对中国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发展的关注是新斯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市场经济并非西方的发明,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通过回顾历史、分析现在、展望未来,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向世人讲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

回顾历史,中国在历史上不仅产生了同时代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且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例如阿里吉指出,在南宋时期,北方的军事压力带来了向南方大规模移民,而南方地区特别适合于高产水稻的种植,通过种植方法的改良和额外劳动力的投入,土地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大提高,高产水稻的种植使粮食产量大于生存所需,这使得农民可以参与到非农活动中去。此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政府鼓励私人海外贸易,并通过为造船者提供资本与技术上的支持来鼓励航海技术的发展。元朝时期,政府继续对海上私人贸易和向东南亚移民给予国家支持,形成了横跨南海和印度洋的海外华人贸易网,但这种趋势并未像欧洲那样引发关于建立海外经济和领土帝国的国家竞

争。到了明朝,国家制定了优先开展国内贸易并不时地进行禁止海外贸易的政策,通过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已在南方形成的市场交易圈得以向北延伸。此外,为了保证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粮食供给,明朝修复并扩大了将南方稻米产区与北方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运河系统,同时,政府在北方鼓励棉花种植,随后北方在原棉生产和长江下游地区在棉纺织品制造方面实现了专业化,通过扶持大运河沿线的南北贸易,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市场。而到了清朝时期,明朝早期国内贸易优先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恢复,“清政府依靠市场机制,养活了不少于而且可能比此前任何朝代都要多并且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等等(乔万尼·阿里吉,2009:323—331)。正因为如此,18世纪的中国被斯密当作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的典型。

分析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具有市场经济传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启市场经济发展之路,而这一道路同样带有鲜明的自然道路的特征。中国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1978—1983年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农民实现了增收。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制造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非农产品的生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开始爆炸性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兴起。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其劳动力密集型定位使其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又未造成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大幅增长;第二,乡镇企业进入各种市场后,加剧了市场的整体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业绩;第三,乡镇企业开辟了农村税收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四,通过将利润在当地进行重新投资,乡镇企业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并为新一轮投资、就业和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乔万尼·阿里吉,2009:366—367)。在此过程中,通过沿海开放和引进外资,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最后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农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对外贸易大发展阶段。但是,这种对外贸易的发展同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武力争夺资源和对外殖民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对外贸易之路。

展望未来,以资本无休止积累为动力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自然道路(以美国为代表)正在陷入困境,而以中国为旗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有着光明的前景,“中国很有可能能够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邦联的出现做出决定性贡献”(乔万尼·阿里吉,2009:392)。具体而言,在美国成为新的资本积累中心之后,这种积累在美国试图创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国家。通过由国家之间竞争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军事主义协同配合,它一方面造就了一个欧洲后裔“致富和获权”的良性循环,但另一方面也相应地造成了大多数其他民族“致贫和失权”的恶性循环——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



在空间上的两极分化”(表现为世界的南北分化)。这种两极分化对北方支配地位的再生产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造成了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问题,而美国通过强制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企图遭到了强烈的反弹。欧洲道路对于东亚道路的优势主要有赖于金融和军事能力的协同配合,但它难以在日益一体化和竞争加剧的全球经济中维持下去。一旦这种协同配合停止运作,以中国为旗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道路就会重获优势地位(乔万尼·阿里吉,2009:88—89)。当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能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城乡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等,因此也面临着转型。但是,如果这种转型能够成功恢复并巩固中国的传统(包括以自我发展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非剥夺性积累、人力而非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等等)的话,中国很有可能能够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邦联的出现做出决定性贡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发展的分析过程中,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建立在“非剥夺性积累”的基础之上。“非剥夺性积累”是同“剥夺性积累”相对应的概念。“剥夺性积累”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用来取代马克思“原始积累”这一概念的术语,按照哈维的看法,“剥夺性积累”在历史上有许多表现形式,但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一直是进行剥夺性积累的主要杠杆,“剥夺性积累所做的就是以非常低的成本(有时是零成本)释放一系列的资产(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抓住这样的资本并立即将其转为赢利用途”(David Harvey,2003:145)。而1970年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私有化政治的兴起(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建议推行的“休克疗法”)构成了现阶段剥夺性积累的利器。不同于哈维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视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大卫·哈维,2016:124),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接受“休克疗法”的方案,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所推行的相对渐进主义”以及中国政府为促进国家市场的扩大与新社会分工之间的协调而采取的应对行动——如在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放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战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扩大并使高等教育现代化等,都表明了这种改革同“新自由主义学派所推崇的休克疗法、最低纲领派政府和自我监管的市场等乌托邦式信仰”是格格不入的(乔万尼·阿里吉,2009:361)。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壮大国有经济的方针,中国在法律上始终坚持土地公有制,“只要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得到维护,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就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乔万尼·阿里吉,2009:15)。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坚持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非剥夺性积累之路,它的发展并

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 参考文献

- [1][意]乔万尼·阿里吉,2009,《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8—392页。
- [2]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36页。
- [3]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2、519页。
- [4]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7页。
- [5]Sugihara Kaoru, 2003,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Arrighi, G. and Hamashita, T. and Selden, M.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78—123.
- [6]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79页。
- [7]沈斐,2016,新斯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第35—42页。
- [8]David Harvey,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5.
- [9][美]大卫·哈维,2016,《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4页。
- [10][英]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8、350页。
- [11]马拥军,2016,如何认识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第5—12页。

## Two Paths Toward Market Economy: Interpretation of Neo-Smithian Marxism

Lai Huiting Lu Chunyi

**Abstract** Neo-Smithian Marxism refers to renewed understanding on market economy through rediscovering or reinterpreting Smithian market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analysis of capitalism and new practice in promoting market economy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by some Marxist scholars in the west, with its core be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paths toward market economy. The two paths include a natural path and an unnatu-

ral path, The former is based on domestic trade, sticking to a path from agriculture, to manufacturing, and to foreign trade, the classic example is East Asia represented by China, in which Industrious Revolution based on mobilizing human resources to improve economic conditions has led to a market-based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labor intensive and thrifty. The latter is predicated on external trade, sticking to an unnatural path from external trade, to manufacturing, and then to agricultur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model include the Netherlands, the UK and the US, which operate on a capitalist model that relies on creative disruptions arising from endless capital accumulation, leading to a market economy model that is capital intensive and relies on resource consump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Neo-Smithian Marxism seeks to tells a story about China's efforts to developmen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Neo-Smithian Marxism Market Economy Natural Path Unnatural Path